

# 历史中人与制度的融合

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中的法度从来没有孤立存在过，始终有人的身影，有人心的温度，影响着历史进程。那么，历史中人与法度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的《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的人与制度的互动》，就是一本要将这个问题讲清楚的书。

在前言中，赵冬梅说，传统的写史方法是以时间为线索，重点书写大事件、人和制度。但本书换了一种思路，“集中关注那些真正塑造了传统中国，对当今中国影响至深的历史要素，并以这些要素为线索，换一种方法讲故事。”

与事件、人物相比，政治制度，是赵冬梅在本书中最为关注的。人与制度的纠缠互动，是本书的第一线索。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是第二个关注点。透过历史文化，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性格。

赵冬梅说，“从制度演变看政治得失，说的是国家的故事；从历史文化看民族性格，说的是群体的故事。”这就是本书要讲的两个故事。可这本书真正带来的价值是，帮助群体理解和认知过去。这对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与民族尤显珍贵，也恰好契合了历史学的价值。

从空间上来说，地理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从时间上来说，华夏民族不仅有司马迁的统一时间，还遵从天干地支的计时法，甚至还有“年号”这样的政治计时法，这些都是得

到民族认同的群体记忆。因此，看中国历史，一定要从一个连续的、从未间断的中国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华夏历史的一部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在我国，民族融合，文化共通的生活方式比民族主义更具有根本性。

说到国家故事，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变化。赵冬梅以“典章经制下的理乱兴衰”作为本书上篇的题目。显然，典章经制的好坏，是否合理，个体与群体是否接受，感受舒适与否，关乎国家命运。中国四千年历史，以汉唐宋元明清诸个大帝国为例，他们在政治制度上以承接为主，局部改革为辅。帝制的特点是，以皇权为中心，调动中央与地方的能力执行各项工作，解决各种问题，以期达到统治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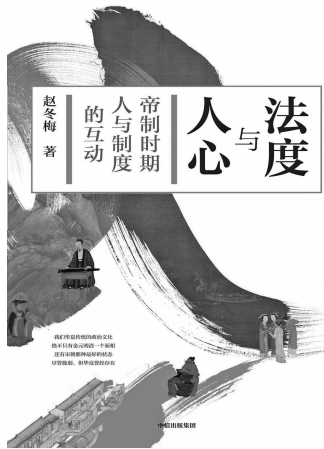
赵冬梅是宋史学者，书中举得而多详细的事件，大部分来自宋代。比如为了保证皇权的安全，地方与中央常常会发生矛盾，造成宰相独揽大权，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宋朝，开创了中国式的“三权分立”：宰相原则上只管行政，另外有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这三个岗位都单独向皇帝汇报。“分权制衡”是宋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改变，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管理制度的创新。因此，典章经制的作用，不仅包括处理皇权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管理矛盾，还包括官员的任用与选拔，以及利益分配。但无论采用何种政治制度进

行管理，好的制度，都要符合公共道德伦理。赵冬梅如是说。

下篇“王朝政治省思”，讲的是中华历史文化记忆。中国的政治统一长期延续，主要功绩来自于文化的不断整合。从天人感应、孝忠两全到道德至上，这些情感共鸣都是帝国上下共同接受的。以现代观念来看，“二十四孝”中的部分故事根本不对，愚忠才是大错特错的事情，所谓的道德至上是不是修史时篡改或是刻意隐瞒真相，替帝王遮丑的理由呢？这是我们对王朝政治应有的思考和反省。

其实，在普通民众统一文化认知背后，依然存在着主流政治文化的变迁。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兴亡。仍然以北宋为例，宋神宗庇护下的王安石变法终将北宋的最后一点政治资本耗尽。可在当时，谁又能想到，宋神宗的悲剧早在宋仁宗无子嗣，将帝位传给养子英宗时，就埋下了呢？宽容的政治未必就一定长久，但政治的残暴化，必然使帝国走向灭亡。大明帝国就是实例。

赵冬梅为本书写的结语非常好，历史并不永远向前。中国帝制政治文化，从宋代的高点慢慢回落，直到1911年的到来。所谓帝制，并非帝王一个人的制度。它需要君臣、百姓、天下苍生的配合，需要集体的力量。人，才是制度的核心。人，才是制度的尺度。



《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的人与制度的互动》  
赵冬梅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月

# 邱园何以成为邱园

邱园(Kew Gardens)始建于1759年，原是英皇乔治三世的皇太后奥格斯汀公主的私人领地，在1840年，邱园变成了一个公共机构。伴随着当时蓬勃兴起的摄影技术，这座显赫美丽的皇家植物园自然而然地把它的身影留存存在了一叠叠的照片里。

从1844年至20世纪70年代，即摄影技术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和彩色摄影技术到来之前，250张老照片，构成了《邱园的故事》一书的主干。那些斑驳的、不甚清晰的黑白影像，比鲜丽的彩色照片显得更厚重，更有沧桑感，可见，编撰者的选择是有意识的，也是有情怀的。

林恩·帕克（邱园的艺术品和文物的助理策展人）与基里·罗斯-琼斯（邱园的档案管理员和记录经理）联袂完成了该书。书中的大部分图像都是初次面世的，既有来自专业摄影师的作品集，也有个人拍摄的照片，包括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的人物摄影、欧尼斯特·威尔逊的植物笔记，还有使用银版摄影法拍摄的棕榈温室、立体摄影时代的T形温室等，搭配简洁的文字，作品的整体气质清新质朴，流露着大不列颠博物学悠久传统的气息。

邱园起初只有3.6公顷，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扩建成为有120公顷的规模宏大的皇家植物园，而且是当今世界文化遗产和国际最著名的植物学研究机构之一。作品述说了这座改变世界的博物

园的辉煌历史。这些照片大致可分为几类：

1. 邱园的景观设计与场所建造。比如，棕榈温室的烟囱被伪装成一座高雅的意大利风格的钟楼屹立在树木之间，优美的线条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2. 邱园的工作照和游客的私人留念，在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都能提供细节支持。

3. 邱园风光和特殊植物的影像。比如，远离原生地亚马逊的潮湿酷热环境、在英国的土地上落地生根、成功培育的王莲，莲叶可支撑小女孩坐卧其上，华美姿容令游客纷至沓来。

4. 重要的历史时刻的记录。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邱园遭到战争摧毁，包括坠毁的直升机，坍塌的场馆，折断的枝干等，以及邱园度过战争难关、战后重建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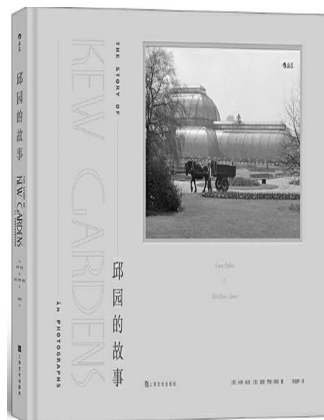
多幅照片涉及威廉·胡克与约瑟夫·胡克。父子俩在19世纪中叶先后任职邱园园长，以出色的工作促成了邱园的“华丽变身”，将邱园树立为一个强大的权威机构。有些照片里的人物是有名的“植物猎人”，比如约瑟夫·班克斯爵士，他的远洋航行行为帝国带回了许许多多新物种，班克斯为之命名、分类，奠定了帝国博物学的实践形态。1896年，邱园招收了第一批女园丁；1913年，作为女性选举权运动的一个环节，运动参与者烧毁了茶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承担了邱园的大部分工作，展现了绝不逊色于男性的能力。编撰者

为女性留出了很多席位，这是别开生面的一段邱园历史。

这部作品浓缩了两位编撰者对这座生活其间、与有荣焉的世界知名植物园的情感。序言就有言，为了“试图讲述一个充满爱的植物园的故事”。不过，邱园的意义显然绝非仅此于此，它包含着更多层面的寓意，带给人们更多的复杂感受。

邱园的成立与发展，并不是为了猎奇、享乐而收集稀有植物，而是为了种植那些对英帝国和民众有益的植物，并最终实现国家商业和财富的增长。棉花、茶叶、咖啡、柑橘、杏仁、橡胶、红木……这些远渡重洋而来的异域植物，实际上展现着英帝国可延伸到的地方，暗示着这个国家会像拥有这些植物一样，控制遥远世界的土地。即使是观赏性植物，在精神层面上也在彰显帝国力量，强化扩张意识。在18世纪下半叶，博物学就已经成为某些重大突破的切口，是欧美列强实力的衡量标准之一。近代邱园是作为殖民体系的一个环节而运转的，发挥着科研机构和信息中心的作用，搜集和交换着从全球各个角落发现的植物标本和知识领域的思想成果。这是它最基本的、最核心的职能。

看到老照片里那些衣衫褴褛的外国劳工，我们的心里是否五味杂陈？当历史可以观看，假如我们足够留意，影像的叙述或许能比文字，比作者原初的预想更多呈现一些事实。



《邱园的故事》  
[英]林恩·帕克  
[英]基里·罗斯-琼斯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1年1月

# 以文物考古打捞蜀地历史

萧易的新著《寻蜀记》是一部以考古发掘、地面遗址来解读蜀地历史的著作——从先秦时期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到南北朝时期的万佛寺遗址、唐代的乐山大佛、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器窖藏，一直到明清时期的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的江口沉银、盐亭的字库塔……蜀地的考古发掘和地面遗址涵盖了数千年的古蜀文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以实物的形式呈现出蜀地数千年的历史与沿革。而关涉其中的人物，则大多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经考古发掘再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命运，不仅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而且还还原了历史的细节，以一种图文并茂、可触可感的形式，把蜀地的历史拉近到一般读者的眼前。

早在唐朝，大诗人李白有感于古蜀历史的神秘，就曾经发出过“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感慨。尽管正史中确有一些关于古蜀国的记载，但是，那些记载或者失之简略，或者语焉不详，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相继发现，新石器时期至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历史将依然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战国时期的开明王族也是同样，这个原本属于传说中的古蜀

国王族，如果没有地下船棺墓葬的发掘，也就很难证实他们曾经的迁移、繁衍、生息，乃至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生活方式逐渐解体，最终融入中原文化大潮之中的过程——正是两千多年后的考古发现，才使得“这些载魂之舟，再次从历史深处缓缓驶来”。而盐源出土的青铜器，则为我们展现了汉代笨人的战争、祭祀、外交、贸易、以及业已远去的迁徙传说。另外，引人注目的还有宋代彭州金器窖藏和明末江口沉银，前者讲述了成都董氏家族的故事，后者揭开了张献忠藏宝的秘密……蜀地数千年的历史和传说，通过文物考古得以佐证。

历史是由无数的个体以及许许多多的细节构成的，这应该没有什么疑义。但在主流历史的叙事中，往往只能择其大端，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从而使得无数的个体以及许许多多的细节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历史则变成了重大事件的历史和帝王将相的历史。《寻蜀记》以考古发掘、地面遗址为线索讲述蜀地的历史，实物图像与作者的文字各具独特的价值。其中，无论是支离破碎的陶片、风雨剥蚀的青铜器，还是神秘莫测的墓葬、色彩斑斓的金银器，在这些实物图片的映衬

下，历史不再是枯燥无味的存在，而变成了一种可触可感的细节；文字也不再是一种呆板无聊的叙事，而变成了可以与实物相对照的现实。由此可见，萧易以微观的剖面解读历史，用考古和文献相互印证的方式探究历史，既能够验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也可以阐幽发微，生动、形象地展示出具体而微的细节，呈现出历史的肌理、温度和质感，从而让他的历史叙事更加丰富、更加清晰。

萧易为我们翻开的其实是一部史书之外的历史，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文字架构和叙事方式告诉我们，文物考古并不神秘，不仅不神秘，通过文物考古，完全有可能让一般民众更加直观地走近历史、了解历史，进而让他们认识到文物的价值，提高他们对于文物的保护意识。的确，以四川为主体的蜀地，原本即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承载者；它们既传递着历史的信息，也描绘着历史的面貌。当悠久的历史消隐在时光深处时，只有它们能够打捞起失落的历史碎片，让消逝年代的生活细节重新进入后人的视野。



《寻蜀记》  
萧易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1月